



軒亭文存

羅敬之◎著

這裡面有學術性的，
有紀念類型的，
也有散文及一部份的
詩歌
時空從先秦到現代，
官人到庶民。

萬卷樓

0021
200610

港 日 下

軒亭文存

羅敬之◎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軒亭文存／羅敬之著.-- 初版 -- 臺北市：

萬卷樓，2004[民 93]

面； 公分

ISBN 957 - 739 - 499 - X (平裝)

848.6

93016504

軒亭文存

著 者：羅敬之

發 行 人：許素真

出 版 者：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傳真(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址：<http://www.wanjuan.com.tw>

E - 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 價：420 元

出版日期：2005 年 3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 - 739 - 499 - X

自序

余出生膠東農家，長於離亂，求學過程多艱。小學畢業後，無力升學，農忙則助田事，農閒復讀小六，如是者三載。抗戰勝利，家庭兩遭無告，田舍畜糧一空，遂於一九四七年新正，遠走異鄉，以爲人農漁維命。後遇煙臺聯合中學南遷，隨輾轉於湘西橋頭鎮，絃歌四月，復遷澎湖，戎旅六年。陽明山中國文化學院新創，考讀中文系，及畢業，年將不惑。歷任該校助教以至教育部核定之正教授。曾以副教授身分，赴香港珠海大學研究所隨名史學家羅香林先生遊，畢業時年已半百，鬢鬚皆二毛矣。

本編爲余二十餘年來之部分研究，與其他專著及以唐代傳奇及清人《聊齋》的散篇論述，則各有所屬，不相關連。計分三類：曰〈論述類篇〉、〈紀念類篇〉、〈雜文類篇〉等，凡收文四十三篇，集錄之以備忘。另有八篇或因篇幅過長，或需尙待補充修正，未及刊列，僅錄於本編之後，聊供參考。

余於整理舊文之際，承張仁青博士再三敦促，謂「文章集中保管，不易散失，亦易查閱，速爲刊行，亦裨用之者」云。亦承許鈸輝博士、賴明德博士暨萬卷樓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梁錦興先生，鼎力支持，於此一併深致謝意。

羅敬之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於臺北軒亭居廬

目次

自序

論述類篇

儒家思想的流變 /003

《論語》《詩》教與《書》教 /013

《史記》導讀 /037

司馬遷傳略 /059

司馬遷南遊路線的觀察 /070

《史記》刺客形象的分析 /085

讀史二題 /101

〈原道〉述評 /107

從蘇東坡的詩看其為人性格 /123

論歐陽修的古文運動 /143

論范仲淹的文學修養（上） /151

論范仲淹的文學修養（下） /162

〈洛神賦〉的創作動機及年代 /171

再論〈洛神賦〉 /184

〈洛神賦〉的用韻 / 219

詩歌源流 / 223

劉禹錫與〈竹枝詞〉 / 232

王士禎三峽行詩紀 / 243

曉公與羅香林先生 / 269

——兼為《羅香林先生年譜》補遺

壯遊中的巨獻 / 289

——從《大地勝遊記》讀起

紀念類篇

思我父母 / 325

懷念林播堯先生 / 331

敬悼羅師乙堂先生 / 334

史學宗師羅香林先生 / 337

懷念洪順隆教授 / 355

雜文類篇

慈湖謁陵記 / 361

〈蘭亭集序〉的品味 / 364

古書選讀舉要 / 366

——答文大中文系一年級同學之問

牟平方言二題 /369

粉嶺居 /373

北地行紀 /381

弔海疆沙場文 /387

金山港 /390

關仔嶺記 /395

鹿港懷古序 /398

《聊齋俚曲》新論序 /399

欣見豐收 /401

三國赤壁 /403

淄博巡禮 /405

《牟平方言詞典》 /415

白血公主馬蘇里 /418

軒亭詞稿 /421

軒亭雜吟 /425

附錄：本編未曾刊行之篇名及年代 /432

論述

類篇



儒家思想的流變

中國傳統文化，自儒家思想誕生，才正式燦爛輝煌。我們一般所說的傳統文化，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傳，自孔子而發揚光大。所以儒家思想就代表了傳統文化。孔子是生在「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一個時代。這樣一個時代，大思想家如孔子者，焉能坐視淪胥？然而孔子救世的主張，非爲守舊也非玄學，而是在於人事和道德的，這人事與道德，他尤其注重實踐的一面；只有在人事與道德的範圍內去實踐，才能體現出「仁」來。我們又怎知他是注重人生的實踐的一面呢？《論語》中他言行的記錄，俯拾即是；但用他簡單的幾句話，就可以反襯出他的這種主張來。如《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由此可知，孔子考察的範圍，是止限於人生實踐方面的。孔子探討的既是爲人之道，他所主張的當然也是爲人之道，所以他曾對他的弟子曾參說：「參也，吾道一以貫之。」（〈里仁〉）這「一以貫之」之道，就是孔子的獨創思想，也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它是修己治人的基本原理，也是實踐道德的最高準則，這準則也就是所謂的「忠恕」二字。《論語》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恕」是夫子的一貫之道，實際上也就是一個「仁」字。「仁」——幾千年來，它滋潤著中華民族的生命，也美化了中



華民族的思想；它深入廣大人民的思想，也與廣大人民的生命同時蕃息成長。但是爲甚麼它畢竟曾一再的跌仆顛躓，甚至也曾一蹶不振呢？

我們要瞭解以儒家爲中心的傳統文化，除了要把握文化的核心以外，還必須要瞭解儒家思想發展的過程。這個發展的過程儘管歷代迭經變化，但經過琢磨和錘鍊的結果，儒家思想仍然挺立不搖。因此我們要想瞭解儒家思想主流，我們的態度尚不止是一般人的態度，我們所站的立場所講的話，必須要表示一個信念，這不止是一個客觀的指出可以看出一個肯定，而是以宗教性的信念來講，也不止是一個客觀的學術來講。因爲若是如此，真理是站不住的。要談儒家思想，又必須注意的一個生命的立根。中國儒家所代表的文化生命，爲何在中國長期發展的歷史裡，而到民國以來，竟喪失其作用？幾十年來，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可以說都認爲中國文化生命已經過時，所以它長期曲曲折折的發展和演變，直至大陸變色，才被判爲極刑。當然這些摧殘文化生命的劊子手也不止限於今天大陸上的統治者，而是自從五四運動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以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要負起助紂爲虐的責任。所以今天的大陸，會一下子被馬列所取代，而變成一個魔道世界，說來既非偶然，也不是止限於某一個單純的問題。

我們要看儒家思想的流變過程，就像看長江必須上溯它的源頭，而不止是僅看到黃浦江一帶；上溯長江的源頭，則對這條大動脈有那些渡口，有那些彎曲，才能看得清清楚楚；否則便不能瞭解長江整個的源流。因此我們看儒家思想的這條大動脈也必須追溯到兩千五百年前。這樣這條生命的發展，也才能貫通起來，也才能瞭解它。

所謂儒家思想已經過時，則並非其思想本相如此，而是人心的取捨有別；然「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且「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告子》上）。既然如此，則何竟有人棄善不爲呢？照《孟子》的說法，人心之所以有不善，是由於人心陷溺於物欲，爲外物所蒙蔽的緣故。因此，儒家思想既應運而生，應世而立，是體大思精且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至於人心的取與不取，於道體的本身固有影響，但非絕對；問題還是人心的取向是否正確。《孟子》曾以「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上）可見可哀的還是選擇者的本身。若以一個文化生命比喻作一個人的生命來看，孟母三遷的故事也正顯示出後天環境的重要性。儒家思想產自亂世，其後不是兵戎爭伐，就是異端充斥，聖人大道，不能驤首排闥，就是其所在各懷私意，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其籍」（《漢書·藝文志》）；且「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莊子·天運》）；而又「佛遣三弟子，教化震旦，儒童菩薩，彼稱孔丘。」（《清淨法行經》）這樣的環境，對於儒家思想的運行，其影響之大，自不待言。

孟、荀二聖對於人性善惡的立論雖有不同，但對於後天師法與學習的環境都曾予重視；並都認爲人是一種道德的人生，即是儒家的道德人生。倘若人生道德不寄予儒家，就註定了儒家思想要接受異端宰割破壞的命運。

從歷史上來看，儒家思想大致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從先秦時期發展到漢朝大帝國的建立，也可以說從孔夫子到董仲舒，是儒家思想表現使命的一個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中國文化最燦爛的一個時期，而儒家思想也該是這個時期的寵兒。雖然這時期的儒、道、墨、名、法諸家，向被列舉並稱，但儒家始終站在領袖的地位，這不因它誕生比較早，也的確有它作領袖的因素。譬如春秋戰國時期，墨家學說也極盛一時，幾有與儒家分庭抗禮之勢，天下咸以儒、墨並稱。然墨家精髓是出自於儒家的；換句話說，當時如果沒有儒家在先，墨學是否能相因而生尚是問題。至於清靜無為的道家，只談玄虛的人生問題，對當時社會不能產生積極的意義，也沒有受到當時社會普遍的重視；名家只談名實，立意雖佳，理論重於實際，而其後來的幾個代表人物，也都變成了詭辯家，對當時社會也沒有多大積極的貢獻；法家在秦的統一上，的確有過不少功勞，但也止限於對秦的統一而言；況且其後出的代表大家韓非，則師出荀卿，後來從荀卿所習的禮，提倡其所謂的「法」。他又把儒、道二家思想冶為一爐，融合而鑄成了他的「法術」。所以就那個時代來說，儒道墨名法諸家，除儒、墨、法三大家對社會還有過實際的貢獻外（雖然後二家嘗師法儒家），餘則乏善可陳。因而歸根究柢，也只有儒家為一枝獨秀了。

下迄秦漢，儒家思想屢受異端所制，生命開始「彎曲」。這種彎曲，首當其衝的要推秦的愚民政策，以及其焚書坑儒。秦皇因不准人民講詩習書，甚至還把藏書者定之以罪，所以儒

家思想的推展遭受很大影響。及至項羽西進，阿房宮大量藏書付之一炬，這對於漢的統一後在社會倫理及學術思想方面的無所憑依是可想見的。秦漢之際而經過楚漢的長期戰爭，天下百姓亟欲休養生息，因此迨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廢秦苛法，大得人心；但清靜無爲也乘虛而入。所以在惠帝之時，君臣皆主清靜無爲。蓋黃老思想所以易爲這個時代所接受的原因，是前述秦代苛法及久經兵燹的人心，需要這種「清靜無爲」及「不爭」的撫慰，況且黃老之說又能直指久困於顛躓疲憊的人心靈的要求。漢武皇帝及秦皇，又都曾經幻想並實驗過長生不老的仙藥；而立足點爲「如何救濟社會」的儒家思想，不可能改變爲「如何控制某些個人的生死」問題，自然社會人心，較易傾向於《黃》《老》。武帝雖極崇儒，又詔罷黜百家，但當時思想界還是向《黃》《老》邁進不已。

《陰陽五行》之說，也是當代思想界一股狂流。漢人善將這種迷信學說，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去。這種學說的魔力之大，範圍之廣，遠及朝鮮、日本，且深受其影響。當代大儒如董仲舒、劉向之流，都是其忠實信徒。直至現代，有些人多少還受到這種思想的支配。如今之所謂六壬、擇日、占星、遁甲，及以徵人事之得失，測禍福之休咎等，即是這種思想的遺傳。

雖然，當秦燔之際，許多學者尙能愛書如命，盡其所能而保存古籍，如北平侯張蒼於漢開國後獻《左氏春秋》，即是一例。及高祖登基，又詔求天下遺書，武帝時更置五經博士，崇儒術、罷百家，設大學聘名師，竭力於文教的发展。所以就漢代思想來說，固然《黃》《老》充斥，但就學術而言，儒家並未盡失天下。許多大學問家，都能把自己一生事業，用在「古書整理」和「古經訓詁」上面去。如董仲舒雖惑於《陰陽五

行》，卻也是儒家的代表。迄東漢末鄭玄出，更綜合了今古文家法，獨創一家之言。可見兩漢四百年間，儒家雖遭不幸，畢竟還有它可觀的成就。

二

儒家思想不能直線發展，而要經過許多「彎曲」，即是道家的興起。

自漢末「黨錮」之禍起，兵連禍結，百姓轉死溝壑，又網羅高懸，賢者紛相隱遁，故如管寧之隱居遼東，諸葛亮的躬耕南陽等是。因致三國以迄南北朝，因為社會黑暗，政治腐敗，經學又支離破碎，而思想界復受兩漢風氣的影響，《老莊》思想又頗為風靡，所謂「清談」，就代表了這個時代的學術及思想風氣。晉時「竹林七賢」的結伴縱酒為樂，消磨其無聊人生，最能說明這個時代的人心趨向。人生原如朝露，不論貧富貴賤，最後既免不了一死，那麼擺脫禮教而及時行樂，正是《老莊》消極的人生指向。且百姓對於生死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而又不能忍受心靈上的長期痛苦，於是宗教信仰又開啓了他們唯一出路。漢末張陵所創的「五斗米教」，正是適合這種社會的需要，因而道教風氣亦大盛。不過鄭玄與王肅的經學，總算還維繫了儒家生命的一線生機。

三

南北朝、隋、唐佛教的興起，則使儒家思想轉入另一個新的彎曲。

佛教來自印度。關於它傳入我國的時期，是在後漢明帝之時（西元58～75）。永平八年（西元65）秋，朝廷遣使赴印度得佛書及沙門，是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上雖易《黃老》而信《老莊》，但也是消化佛教的一個時期，及至隋、唐，佛教才勃然盛行，當時思想界可以說完全受著佛學的支配。隋唐以前雖然在消化佛教，但正偏重於佛學的翻譯與理解，而隋唐卻完全把它加以融化，變成了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把佛學變成徹底的中國化，佛學就等於是中國文化。當時佛教的組織和體系，經過隋唐諸大師的孜孜矻矻，儼然全備。且李唐以其系出《老子》，道教也同時風行。因致兩教互爭天下，各不相讓。儒家思想經此一擊，著實立足益艱。尚幸唐初《五經正義》，中唐韓愈的〈原性論〉及李翱的〈復性書〉，不啻給儒家生命注下一劑強心針；尤以《五經正義》，對儒家生命復活的貢獻至大。因此這些經籍的出現，不止是復甦了儒家生命，而且還下開宋明時代的新儒學。

四

像是一個久別故鄉的浪子，千里迢迢，好不容易回到家來，則又遭逢著流離的命運。

自北宋開始，儒家思想經過許多彎曲後，像是回到家來，這一回轉，也有七百多年的歷史。兩宋時期，是以理學為著，明代則以心性為名，不論理學心學，都把儒家學說視為聖學。宋以朱熹集大成，明以陽明為主流。朱子並以《孟子》的人倫五教，作為白鹿洞書院的學規；王陽明也曾說：「古之教者，教以人倫……」這就是以儒家的人倫學為經，以世界道德說為



緯，故自儒學誕生而中途經過那麼多曲折以後，直到宋明時期，才又恢復其傳統地位。可是不幸，迨明朝亡國，則是中華民族發展中一個最不幸的挫折。以兩漢而言，《黃老》及《陰陽五行》是儒家思想發展中的有力的對手；以隋唐言，則佛教喧賓奪主，是儒家發展中的洶湧的逆流。詎料方得休養生息而趨發榮滋長，竟遭明亡的厄運；這一創傷，是文化發展中的最大彎曲。因此儒家思想不得不在一個病態中延續下去。

明亡於西元十七世紀，這時正是西方開近代文明而學術思想蒸蒸日上的時代，此後三百年間，中西方的學術發展大不相同；而我們所講的「現代化」，正是西方三個世紀以前的事。在這三百年間因為西方的學術思想是蒸蒸日上，而我們在步步下降，所以各方面皆受到挫折，可以說全部是一種病態。清代乾、嘉年間的考據之學，在某一方面說，雖有其貢獻，但它不是文化生命的自然發展，而是在病態中所產生的一種病態現象。其結果，乃使中國以前文化中的智慧喪失，沒有生命力，更沒有思想的動力。所以滿清三百年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講，都不精彩；唯有一點精彩的，似乎就是那部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和納蘭性德的詞了。這樣子說來雖然不夠嚴肅，事實上則確實如此。總之，中國的學術傳統思想、政治及藝術等各方面，在清代均告喪失，也所以發展到民國以來，中國人幾乎到了不會用思想也不知思想為何物的地步了。沒有正常思想及正當理路，即不能說是有思想。無論那一種學問，都有一個傳統；假若到了一個時代我們連甚麼都不懂時，民族的文化生命自然就要萎靡消失。

中國在先秦時期，是百家爭鳴，諸子紛紛立言勸世，所論容或不同，但各有其思想理路。魏晉有玄學，南北朝、隋唐有